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中国教育科学

Education Sciences in China

2014年

第**1**辑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中国教育科学

ZHONGGUO JIAOYU KEXUE

2014年
第1辑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 组编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教育科学. 2014 年. 第 1 辑 / 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
分会组编.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4. 1

ISBN 978-7-107-27967-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教育科学—中国—文集
IV. ①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18560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 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80 千字

定价: 30.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邮编: 100081)

主编的话

一年来,《中国教育科学》致力于发表具有学理性、系统性的教育创新成果,刊登了40多位专家学者的长篇论文,得到了教育学界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在已出版的四辑中,“大家论坛”栏目独具特色,引人注目。特别是先后为本栏目撰稿的南国农、顾明远、胡德海和黄济先生都在耄耋之年,他们宝刀不老,文笔犀利,思想精辟,令人感佩。同时配发的钟志贤、项贤明、高闰青、石中英教授探讨这四位先生教育学术思想的文章也各有千秋,均为佳作。加上“回顾大家”栏目中于伟、张武升教授分别总结陈元晖、张敷荣先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以及孙孔懿教授论教育家的论文,对了解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理论大有裨益。在2014年的“大家论坛”里,我们还将先后刊登章开沅、李放、郝克明、鲁洁先生的大作以及周洪宇、邬大光、张力、高德胜教授研究他们对我国教育学术贡献的文章,值得期盼。

刊发教育学科研究的成果,是去年本辑刊的一个重头戏。除了南国农先生关于电化教育学科发展的追忆和胡德海先生对什么是教育学与教育学体系的研究之外,“教育学原理”栏目发表的侯怀银、董标、查有梁、王北生等教授就我国教育学的研究道路和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课程教学论”栏目廖哲勋、李森和王鉴等教授关于课程论和教学论建设、课堂教学研究的探讨,“学习科学”栏目任友群、丁念金教授关于国内外学习学进展的评介,“教育史学”栏目周洪宇、史静寰教授关于中外教育史学的反思,“学科教育学”栏目顾之川、王慧君和李震教授关于中小学语文和物理教学研究的回顾总结,“教育科研”栏目曾天山、王坤庆教授关于新中国教育科研之路和教育研究方法的纵横谈,“学术感悟”栏目孙绵涛教授对教育学术追求的体验等,都是教育学科研究领先的创新成果。在2014年,我们将继续刊登一批探寻教育学原理、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管理学、教育技术学、教育人类学、高等教育学、学前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史学、德育论、课程教学论和学科教育学等方面的优秀论文。

2014 年第 1 辑

封面题字

顾明远

主 编

郭 戈

副主编

刘立德

编辑部主任

石筠波

编辑部副主任

韩华球

英文编辑

付 蕾

封面设计

于 艳

联系电话

010-58758980

传真

010-58758991

电子邮箱

zgjyhx@pep.com.cn

邮编地址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

中关村南大街 17 号院 1 号楼

主编的话

大家论坛

章开沅 汲取历史智慧 回归教育本真（序言二则）/3

周洪宇 章开沅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学术贡献/11
刘大伟

政策研究

王登峰 中国学校体育工作的困局与破局/31

教育学科进展

范先佐 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成就、问题及趋势/49
郭清扬

德育研究

王小飞 当代东西方德育发展的比较与反思/67
檀传宝

冯建军 中小学生世界公民身份认同现状的调查研究/85
白旭娇

课程研究

李臣之 课程思潮研究的分析框架/105

代建军 我国课程运作机制研究/123

教育家之林

孙孔懿 教育家谱系：一张历史织成的逻辑之网/151

教育书评

余小茅 繁荣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学术书评/169

叶小沫 《爱的教育》九十年/188

朱永新 温家宝的教育情怀与理想

——读《温家宝谈教育》/191



章开沅 1926年生。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安徽芜湖。1946年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历史系。1948年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1951年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3—1990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1985—1991年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1986年任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1990—1993年，历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与普林斯顿神学院客座研究员、耶鲁大学历史系

鲁斯学者、加州大学分校历史系客座教授。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荣誉法学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1996—2010年任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现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名誉所长，池田大作研究所名誉所长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任，国学院名誉院长。2012年在南京大学110周年校庆杰出校友评选中当选为“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作为享誉国际的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和领导人，他在辛亥革命史、中国商会史、中国近代文化教育史、中外近代化比较、中国教会大学史、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等研究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论著主要有《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从耶鲁到东京——为南京大屠杀取证》《传播与植根——基督教与中西文化交流论集》《中国著名大学校长书系》（领衔主编）等。

《汲取历史智慧 回归教育本真（序言二则）》导读

-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中国近代教育史是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大转折
 - 对中国近代教育史给以“曲解”和“排除”的消极现象曾长期存在
 - 学点中国近代教育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 “寻找真正的陶行知”
 - 陶行知教育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
 -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海外也有历久不衰的深远影响
 - 《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出版必将促使陶行知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
-

深入系统地探讨教育教学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也是本辑刊的重要使命之一。去年刊发的顾明远先生关于教育的文化研究，黄济先生、张铁道教授等关于中小学国学教育的见解，何克抗先生关于教育信息化成败的思考，陈桂生先生对“师说”的别解，和学新教授倡言教学的生活逻辑的主张，储朝晖、韩延明教授关于大学精神和大学校训的省思，余小茅教授建构书香中国的设想，以及鄙人对西方兴趣教育思想史的梳理与诸惠芳编审编译的奥斯特曼一百多年前创作的《兴趣教育》著述节选等，都是教育教学问题研究或相关领域的有益探索，其中不乏力作。

虽然《中国教育科学》定位于教育学理论研究，但不偏废教育政策问题。鉴于这方面内容十分丰富，我们计划有侧重地刊登教育部有关司局长、各地一些教育厅长或师范大学校长对于国家或地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改革发展宏观研究和战略思考的成果。在去年底新开辟的“政策研究”栏目里，首先发表的是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司长王定华教授与陕西师大党委副书记司晓宏教授等关于国家义务教育与西部农村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研究报告。今年，该栏目还将发表教育部体卫艺司司长王登峰教授、社科司司长冯刚研究员、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兵教授、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研究员以及华中师大校长杨宗凯教授等人的文章。相信这对于教育学人了解国情、把握教情，进而创新理论一定会很有助益，敬请关注。

值此2014年元旦春节之际，我们谨向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分会会员、教育学界同仁以及所有关心支持《中国教育科学》的朋友们，致以新年的祝福和诚挚的感谢！

在新的一年里，《中国教育科学》将继续专心教育学理，注重深入研究，着力理论创新，践行联系实际，为打造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教育科学体系而不懈努力！

汲取历史智慧 回归教育本真

(序言二则)

章开沅

【摘要】中国近代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它与我们相距最近，而且因为它是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大转折阶段，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奋力拼搏，中国教育无可逆转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还有一大批各类各级学校办出了较高水平，同时也涌现了不少海内外知名的教育家。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深刻、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肯定与尊重。

陶行知教育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为后世留下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出版必将促使陶行知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关键词】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陶行知；年谱长编

《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① 总序

历史不仅是集体记忆，而且是集体智慧，是人类数千年改造自然并且改造自己的集体记忆、智慧的丰厚积累。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他们把历史划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史与人类史，两者相互制约。他们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

^①《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系人民教育出版社策划的大型教育丛书，旨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我国近代教育发展史进行专题的、个案的深入探讨，以促进教育史学科研究和教学水平的提高，为该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并以科学性、前沿性的标准，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视角，着重探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社会教育、乡村教育等创建和发展的基础和背景，考察其发展的历史轨迹与脉络，评析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活动、社团和著作，总结代表人物的思想与贡献，并联系当前实际，从近代教育发展趋势中吸取经验教训，得到有益的启示，为当代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借鉴。本丛书已先后出版《中国近代社会教育史》《中国近代德育课程史》《中国近代乡村教育史》《中日近代教育关系史》《中国近代西部教育开发史》《中国近代科学教育史》《中国近代大学精神史》《中国近代教育行政史》等八种。

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①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特别是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曾经认真研究过这个简短的注释，但至今我们仍然可以从中汲取极为深刻的教训。

教育史是人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就在于它着重研究人类如何改造（优化）自己，包括其理论、理念、方式、方法与实践诸方面。教育史不仅记载了教育如何随着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变化，同时也记载了教育如何促进了社会的进化，特别是具有前瞻性的教育又如何推动了社会的根本变革。但是，我认为教育的发展通常不宜用“日新月异”一语来表述，因为教育毕竟是一种塑造人的慢工细活。教育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忽略前后传承与相对的稳定，因为教育本身具有人所共知的长期性与持续性的特点。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变迁，但是教育的发展又具有自己相对的独立性，有其绵延千年、衔接古今的内在规律。当然，教育决不是孤立的存在，教育的发展与校园以外的各种社会因素紧密相牵连，教育的任何重大变革都是一桩繁密细致的系统工程，都需要经过多次的实验与不断修正完善。因此，教育的革新在更多时间经常表现为渐进式的积累以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动辄以政治威权和“群众运动”推行的粗暴“教育革命”，不仅难以实现短期速成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伤害了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20世纪初著名的新式教育倡导者张謇经常说：“欲速则不达”，“行百里者半九十”，即深悟其中三昧。

中国近代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它与我们相距最近，而且因为它是中国教育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大转折，也可以说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初始阶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先驱者的艰难困苦、呕心沥血，为后世所难以想见。中国教育现代化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畸形环境里发展的，而且又是在既痛恨列强侵略又必须向西方学习先进教育制度的矛盾心态中奋力前进的。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其发育不良与诸多方面的局限是无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绝不能以虚无主义的眼光来看待这段历史。从科举应试教育到新式各级学堂，这乃是中国教育史上的“千古大变局”，经过几代人的不断奋力拼搏，中国教育毕竟无可逆转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且还有一大批各类各级学校办出了较高水平，同时也涌现了不少海内外知名的教育家。他们教育思想的丰富深刻、办学理念的卓越高远以及实践业绩的泽惠后世，至今仍然受到中外学者的高度肯定与尊重。可以说，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他们都给人们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

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意识形态（加上某些政治因素）的干扰，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史给以“曲解”和“排除”的消极现象，曾经长期存在。从20世纪50年代的“学习苏联”、“教育革命”，到60、70年代的“学术批判”、“文化大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为中国教育现代化而鞠躬尽瘁的这些伟大先驱及其学术与业绩，统统都被列入“封、资、修”的反动范畴，经过粗暴批判而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

为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早已为人们所熟知。我只想提一个醒，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教育革新，其中许多曾经名噪一时的所谓重大举措，如学分制、聘任制、选修课、学位制度乃至讨论式教学等等，很多是中国近代史上那些“旧学校”早已实行多年且初见成效的“老一套”。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今教育革新的深化，经过长期的反复的冷静反思，终于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不管科技与经济发展如何日新月异，教育理应适应于社会的变革而进行相应的变革，但对于过往的教育总还有一些应该继承（即令是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即令是超越前人）。正如有些论者所言，人们首先是缅怀那些博学睿智的大师，随即联想到那些大师栖息弦歌于其间的著名高等学府。起初热侃的似乎是集几所名校之精粹的西南联大，随后往上推移终于深入探讨一大批名校（如北大、清华、燕京、金陵等）办学之何以有成。这不是怀旧，更不是开倒车，而是重新审视教育自身内在的规律，以及体现这些规律的某些相对稳定且应持续继承的办学理念。例如培养目标中必不可少的人格塑造，教学工作中必须发扬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以及校园理应享有的学术自由与民主空气，等等。中国近代史上的先驱者在这些方面曾经有所执着，有所追求，也曾经取得了程度不等的进展，但囿于当时的环境而未能大有所成。我们应该坦诚自责，现今这些重要方面的改进工作仿佛又是重新开始。而教育的人文关怀，甚至还要有待于现今上层领导的三令五申，才使不少浑浑噩噩、随波逐流者有所醒悟。这乃是中国当代教育的极大悲哀。

由此可见，学点中国教育史，特别是学点中国近代教育史，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正是有鉴于此，人民教育出版社在改革开放以来，为中国近代教育史的教材建设与学术著作的策划编辑出版作出了极大努力，并且有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问世。这些出版物或则比较系统地整理了近代中国有价值的教育理论文献，或则对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思想、理论、实践、人物，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和阐述，为在新世纪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世纪世界格局与中国自身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迅速、巨大而又深刻，人们对教育革新的要求之高与期待之殷也是空前的。为加强新世纪中国教育史学科教材建设和学术著作的出版，人民教育出版社遂策划出版一套《中国近代教育专题史论丛》。根据我们的理解，它既是一套体现中国近代教育史最新研究成果的学术专著，又是一套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史学科的优质教材，可供教育学、教育史研究人员和师范院校高年级本科生阅读，也可作为广大中小学教师提高教育理论素养与教育史学素养的必备读物。这套丛书不追求大而全，而是从若干专题研究入手，特别是从该学科研究的薄弱环节入手，着重探讨近代中国社会教育、乡村教育等等创建与发展的基础及其背景，考察其历史轨迹与发展脉络，评析其间曾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活动和著

作,总结代表人物的思想、实践与贡献,并联系当前实际从近代教育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认真寻求有益的启示。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而且各地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发展又很不平衡,如果不先做扎扎实实的专题研究与区域研究,就很难写出一部名实相符的高水平的中国近代教育通史。所以,这套丛书的出版是新世纪中国近代教育史学科大发展的重要起点,我们需要继续努力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教育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也是各界人士眼光集注的焦点,我们希望专业的和非专业的广大热爱教育的人士携起手来,为21世纪中国教育与教育科学的真正腾飞而共同努力。

《陶行知年谱长编》^① 序言

我的一生似乎都与陶行知有某些缘分。

我祖籍浙江湖州,但出生于安徽芜湖,与陶公的家乡同属于皖南美丽水乡,是为先天的乡谊。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就非常仰慕这位乡贤,晓庄师范、小先生、普及教育、山海工读团乃至孩子剧团等等,都是我们谈兴甚浓的话题,堪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陶公是金陵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的高才生,我于1946年也就读于金大,虽然资质鲁钝而且相隔20多年,但多少已产生若干学谊情结。当时我已接受民主革命的洗礼,陶公虽然是由于劳碌病逝,但在我们心目中也是如同李公朴、闻一多那样的革命烈士、学界圣贤。1948年春天,金大电化教育科制作幻灯片《武训传》,我及时在进步墙报《天南星》上发表《陶行知与武训》时评,认为当前中国正处于根本变革的前夜,理应更为重视弘扬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1948年冬我长途投奔中原解放区并进入中原大学学习与工作,在政治研究室又有幸结识曾任孩子剧团团长的吴荪生,他经常提到陶行知若干往事,更增添了我内心的亲近感。但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陶行知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公正评价,首先是全党全国“以俄为师”,把凯洛夫教育学奉为经典,而陶行知教育学说却被冷落在一边。及至《武训传》电影横遭批判以后,杜威与胡适、陶行知师生都受到株连,沦落成为全盘摒弃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尽管以后学校仍然标榜为社会服务、与生

^①《陶行知年谱长编》共四卷,约150万字,由周洪宇、刘大伟撰著,即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以编年体的形式重现“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五十五年短暂而光辉的一生,记录其所产生的时代影响及学术轨迹,并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了谱主去世之后有关谱主的学术活动。本书编撰按“先时事,后谱文”的体例,不仅交代谱主出生时的时代背景,而且在每一年谱文前勾勒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图景,以便让读者能在时代的风云变幻中,领悟谱主人生思想的发展变化。

产结合、理论联系实际，但是这些似乎都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毫无关系，甚至两者还相互对立。

以后，陶行知在 20 多年间似乎已被人们遗忘。但是，历史毕竟是向前发展的，1976 年“文革”结束以后，生前身后都饱受磨难的陶公终于重见天日，逐渐再次获得国人的认知与肯定。华中师范学院堪称开风气之先，当时学校的领导班子具备足够的胆识与勇气，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自行组织教育科学研究所部分教师编辑出版了首部《陶行知全集》（所谓“湘版”），并着手加强陶行知研究。

我经常自称是陶行知研究的“后进”，因为“文革”后百废俱兴，我承担的首要任务还是中国近现代史的学科重建，以及日益频繁的辛亥革命研究国际学术交流。直至 1986 年辛亥革命与孙中山研究的热潮已经告一段落，而我由于已经参加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并且还成为召集人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有比较广泛而又良好的人缘，教育部相关领导才把我内定为正在蒸蒸日上的全国陶行知研究的协调人之一。作为陶公的嫡传门人，当时的教育部党组成员张健对陶研感情极深，也最为投入。他曾对我面授机宜：（1）认真参与全国陶研协调工作，共同努力提高陶研的学术资质；（2）带头从事陶研，最好能写一部水平较高的学术性传记；（3）加强华中师大陶行知研究中心的团队建设，培养中国第一个陶研博士。张健颇有乃师遗风，热情坦率，平易近人，话语简要，开门见山。我们的首次交谈就像是曾经结识多年的老友，丝毫没有上下级的感觉。因此，我参加陶研从一开始就没有“客串”之感，而是直接以“自家人”身份全身心投入其中。

坦率地说，我是在深入研究陶行知，特别在结识许多他的亲属及其弟子之后，才开始真正了解陶行知。所以，我与唐文权在合作撰写陶行知学术评传《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之始，便强调一定要“寻找真正的陶行知”。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传记仍然或多或少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特别是我们自身学术认知水平的制约。好在认识本来就是一个逐渐深化完善的过程，而且“寻找真正的陶行知”也不是若干个人所能实现的。我很高兴地看到，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在全国各地同行学者的共同努力下，陶行知研究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显著进展。特别是老一辈的陶研先进，如方明、张健、胡晓风等，他们本身就是当年行知教育的对象，亲自领受过陶公的沐浴，而后又成为行知教育的继承者与弘扬者，终生为推广并发展行知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后辈学者树立了光辉榜样。

陶行知教育理念具有超越时空的生命活力，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历史遗产。更为令人欣慰的是，陶研已经在全国蔚然成风，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到处都可以遇见自称“小陶子”的陶研会成员，都可以察觉行知教育已经深深扎根于中国的广袤土地，而且在有些地区已是绿树成荫子满枝。每当我回想 1987 年暑假与各地众多“小陶子”在南京拜谒陶公墓时，一种类似麦加朝圣的崇敬之情便油然而生。我认为

此乃世间真情，是我们民族乃至人类精魂之所在，用陶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境界：“爱满天下”。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海外也有历久不衰的深远影响。前些年，我有幸应邀参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汉森（David T. Hansen）教授主编的《影响深远的教育理念：教育哲学与实践的伦理视野》一书的撰稿工作。全书共收20世纪十大著名教育家，其中亚洲只有两位，一位是日本的牧口常三郎（1871—1944），另一位就是陶行知（1891—1946）。前者是创价教育体系的先驱者，后者则是生活教育体系的奠基人。按照编者的说法，他们与其他八位大家的教育理念的影响都将促使人类更加公正、更加祥和、更加辉煌。可见，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中的瑰宝。

从2005年开始，通过与创价学会的第三代会会长池田大作长期对话，我逐渐发现牧口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有许多共通之处，都曾接受杜威的启蒙，都注重教育当中人生价值的创造，都努力普及国民教育，都关爱贫苦弱势群体，都追求教育革新与社会公正，都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等等。从牧口常三郎到户田城圣再到池田大作，创价教育薪火相传，愈久弥新，其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正向世界各地扩展。我国陶行知思想的研究与实践，特别是生活教育的不断创新，其发展势头之蓬蓬勃勃，亦堪与东邻比美。而创价教育在国际化方面所取得的丰富经验，更值得我们作必要的借鉴。我认为，现今中国正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借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固然很有意义，但像陶行知这样已为世界公认的20世纪伟大教育家、思想家，我们是否也应该在向世界推介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呢？

洪宇在本科阶段是中国近代史的课代表，与我接触比较密切。毕业后虽然分配到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但因为参与编辑《陶行知全集》，仍然与历史研究所（现今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多有联系。后来经张健建议，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并选定陶行知研究为主攻方向。他不仅以自身的艰苦勤奋进一步打好此后学术生涯的坚实基础，而且还帮助我很快就融入陶研这个学术圈子，经过20多年风风雨雨，陶研至今仍然是我所重点关注的。特别是《陶行知年谱长编》，原来就发端于我的建议，经过他20多年的苦心经营与勤奋积累，终于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付印问世，这更使我在迟暮之年得到莫大的慰藉。年谱长编是历史编纂的重要体例之一，也是编写人物传记不可逾越的一级阶梯，而年谱长编的上乘之作本身往往就是一座独立的学术丰碑。胡适曾说：“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这确实是大学者的深刻感悟。年谱长编按年月顺序，以时为经，以事为纬，以原始资料为依据，以语必有根为上乘，简要平实，弃绝议论，最有利于客观公正而且更为全面地再现传主丰富多彩的曲折人生。我深信，这部约150万字的《陶行知年谱长编》的出版，必将促使陶行知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洪宇自称：“花这么久的时间为他编撰一部年谱长编，既是对这位教育家前辈的

敬仰与纪念，也是尽自己一份学者的职责，履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使他的思想、事业与精神得到永久的传承与光大。”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踏踏实实这么做的。他不仅研究陶行知，而且在实践中弘扬乃至超越陶行知。因为陶行知已经逝世 60 多年，他不可能未卜先知当代教育的现状与问题，这些问题只能由我们这些后继者来回答并谋求解决。这决不是某种僭妄，而是真正的教育家应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我认为这才是真正以陶行知精神来研究陶行知。归根到底，还是陶行知说得好：“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秉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在金钱追逐与功利主义严重腐蚀教育的今天，如何让教育回归自己的本真，校正自己的航向，乃是我们教育界大事诸端中的头等大事。我们应该把陶行知这些发自内心的真诚话语，作为刻骨铭心的警世良言，犹如暮鼓晨钟，时时拷问自己的心灵！

即以是为序。

2013 年 6 月 20 日

（责任编辑 冯卫斌）

《中国教育科学》编辑部声明

本学术辑刊是国际 DOI 中国出版物注册与服务中
心会员，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及 CNKI 系列数据库收录。作者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学术辑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声明。



周洪宇 1958年生，湖北武汉人。教育学硕士、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教育史专业导师组组长、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职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现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兼任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发展战略学科组成员、国家教育督导团专家组成员、教育部教师教育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设置委员会成员、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刘大伟 1981年生，江苏洪泽人。先后于杭州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硕士、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任职于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院。

《章开沅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学术贡献》导读

• 章开沅先生的教育人生	(11)
• 章开沅先生的教育思想	(13)
论教育本质	(13)
论教育功能	(15)
论课程设置	(16)
论学校管理	(17)
• 章开沅先生对教育史学研究的学术贡献	(20)
对教育史学理论研究的学术贡献	(20)
对教会大学史研究的学术贡献	(22)
对陶行知研究的学术贡献	(23)
• 结语	(28)

章开沅先生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学术贡献

周洪宇 刘大伟

【摘要】当代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从教60余年的历史中，在教育本质、教育功能、学生培养、教师发展、高校管理、国际交流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一切以“做人教育”为教育根本宗旨的目标下，章先生以爱为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属点，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社会人才。同时，在任职华中师范大学校长期间，他充分发挥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通过“一校一县”模式将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在教育学术研究领域，章先生结合史学特长，在教育史领域开辟了教会大学史研究，并在陶行知研究中后来居上，成为这些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学术研究本着“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的态度，以批判的态度公正客观合理地评价教育历史中的人和事，求真存实，回归历史本身。

【关键词】章开沅；教育思想；教育学术研究；教育史；教会大学史；陶行知研究

一、章开沅先生的教育人生

章开沅先生原籍浙江湖州，1926年7月8日出生于安徽芜湖，后相继进入芜湖襄垣小学、萃文中学读书。抗战爆发后，章先生随父母西迁重庆，并于1938年冬入江津国立九中继续读书。中学时期的先生“酷爱文学，勤练写作，由于牢骚太甚，语多冷峭，同学间有以‘小鲁迅’相称者”^①。1943年夏，因为“思想问题”，先生被学校开除学籍。同年10月，先生又入重庆计政人员专修班学习会计专业，至次年5月又因与军训教官冲突被开除。此后两年有余之间，先生浪迹江湖，备尝苦难。

抗战胜利后，章先生于1946年10月东归，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就读，师从贝德士(Dr. Bates)、王绳祖、陈恭禄等教授，进行了数年的史学学科训练。但先生却以为“大学时代，虽然在历史系读书，但并未树立此项专业思想。除听课与应付作业、考

^① 章开沅著：《章开沅演讲访谈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页。

试之外,爱读文学作品与其他社会科学书籍,并未认真攻读史学经典。”^①这期间,章先生积极参加进步主义学生运动,先后在金陵大学“天南星”的墙报上发表多篇文章,讽刺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经济策略。但先生此时志向并非在于研究历史,而是想成为一名战地记者,自觉“那才是充满挑战的够刺激的职业”^②。因此,章先生于1948年冬辍学奔赴解放区,本想成为一名“跨马佩枪、文武双全”的战地记者,却不料被中原大学相中,成为该校政治研究室革命史组的理论教员,自此先生与历史之缘再也无法分离。

1949年,先生随中原大学南迁武汉,在该校教育学院历史系工作。1951年,中原大学与华中大学合并,两年后正式定名为华中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先生遂在该校历史系和近代史研究所任教至今。先生尽管眼下已是88岁高龄,仍每日坚持步行到研究所自己的办公室,读书、写作,诲人不倦。

20世纪50年代以来,章开沅先生一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研究方面侧重于辛亥革命史,特别是张謇研究。1963年,章先生得著名历史学家、中央文史馆馆长、国务院副秘书长杨东莼先生欣赏提携,被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借调赴京协助工作。这期间,章先生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整理出了20余万字的《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初稿。可以说,北京之行成为先生学术生涯的一个新起点。1964年,章先生不幸因文字得祸,横遭批判,成为湖北省的重点批判对象。1966年春,经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借调,先生才有机会协助筹备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学术方面的工作。未几,“文化大革命”开始,章先生受到更为严重的冲击,学术研究随之长期停顿。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章先生逐步恢复正常的教学研究工作的,且一发而不可收,先后主编或独自撰写出版《辛亥革命史》(三卷本)《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辛亥前后史事论丛》等专著,并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发表多篇论文。20世纪80年代中期,先生为了进一步拓展历史研究的领域,开始着手中国现代化研究与教会大学史研究,主编出版了《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等书。章先生晚年更是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这一领域,他多次应邀前往美洲、欧洲、大洋洲等多个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更是于1990—1993年先后在美国的普林斯顿、耶鲁、加州三所大学任教和研究达三年之久,为中外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

作为一名历史学家,章开沅先生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国商会史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文献研究、教会大学史研究方面都有着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同时章先生也是一位教育家,他在60余载的教育历程中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

①② 章开沅著:《章开沅演讲访谈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9、360页。